

导 言

“即便是走马灯似地浏览一下我们这个地球上不同地区人民的生活 就足够可以提出很多问题 为什么如此悬殊的贫富差异在同一大陆、同一国家、甚至同一城市共存 传统的、低效率的、生计艰难的社会如何转变成为现代的、高效率的、高收入的社会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使尼日利亚、巴西或菲律宾边远地区的贫困农民转化成为成功富有的商业农场主？”(Todaro, 1985: 6)一旦我们开始观察中国各个地区农村生活的图景 托达罗的这些疑问油然萦绕心间。

一、中国农村生活的当代图景

在许多人眼里，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外国人眼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是一体的、一致的、整齐划一的。这种看法如果说在几十年前还多少有些道理的话，在今天则是一个很大的谬误。每当醒来面对新的一天时，中国各地的老百姓的境况各异。有些人居住在有众多房间的舒适家庭中，他们食品充足 衣着华贵 身体健康 有着满意的收入和保障 未来等待着他们的也是美好的生活前景。数千万的人却生活在贫困之中 他们居住条件恶劣 营养不良 健康状况很差 他们中绝大多数不识字 没有可靠的赖以营生的工作 他们对较好生活的希望是暗淡的 充其量也是不确定的。

比如 首先考察一下福建‘金三角’村民的生活。华南地区农村发展研究方面的人类学者石弈龙 通过他的田野工作 记述了厦门市郊蔡塘村城市化的图景 并把蔡塘村的城市化过程称作是中国城市化的一种模式 石弈龙 1996:140~170)。

由于和厦门临近 交通便利 蔡塘村的经济一直与厦门市有着密切的联系。过去 他们主要种植蔬菜供应厦门市 是厦门市蔬菜公司的 11 个蔬菜基地之一 一种蔬菜成了全村主要的经济活动，这里又松又大的槟榔芋是本村远近闻名的特产。1978 年 蔡塘村的整体经济结构是农业为主 工业为辅。从 1988 年以后 蔡塘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包括建筑、交通运输在内的工业企业 工业总产值逐年上升 工业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蔡塘村经济结构的主体。村里劳动力的分布也早已转化为以工业企

业和第三产业为主了。^①

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的变化相伴随，村里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处在急速的变迁中。到 1993 年为止 蔡塘村已有 280 栋二层到三层形式各异的小洋楼，平均每户 1.2 栋。绝大多数新楼房都配有设备齐全的卫生间。在家用电器方面，几乎每家都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和自来水的普及率也很高而且更新换代很快。村里小轿车、工具车、小面包、农用车已有了五六十辆 其中有的是用来营运挣钱的 也有不少是村里人出门办事的代步工具或者财富荣耀的象征。在其他方面的变化也是值得一提的 家用电话、大哥大、传呼机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 每家每户做饭的燃料 液化气已经代替了煤球 过去村里有剃头师傅为村民服务 如今村民已嫌剃头师傅的手艺太“土气”而是到市

① 基于对蔡塘村改革前后近二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田野调查，石弈龙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说 蔡塘这样的农村是在厦门特区经济建设的背景下，通过发展工副业，促进村民经济收入的逐步增长而逐渐获得城市的生活方式的，这也许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模式或途径。”石文并没有展开对这一模式的论述，因而对下列问题未置可否：为何称之为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具体特征有哪些？是否已经有农村城市化的其他模式？如果存在其他模式，蔡塘村城市化模式和其他模式相区别的特征是什么 等等。该研究报告冠以“城市化模式”这样的题目 想必是为了简单、吸引人，其他用意似乎难解。如果要将石文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我通读全文之后领悟到的下列要素似乎构成了蔡塘村城市化模式的主要特征：位于大城市郊区且该城市为经济异常活跃的经济特区 或沿海开放城市 受大城市和特区经济辐射，腾飞发展的工副业成为村经济和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引进外资外商 开工厂 或建设工业小区 是农村城市化最主要的驱动力 村民逐渐获得了城市生活方式，成为拿着农村户口的城市化的农民，他们甚至在物质享受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为大城市的人所羡慕。据此 这种城市化模式将适合于广东、福建、江苏、山东、辽宁、天津等地处沿海 自然环境和基础条件优越 改革开放形势红火的经济特区或开放城市的近郊农村。至于这些地区的发展路子在多大程度上适合蔡塘村，则需要深入、细致的经验性调查研究。

区的理发店去理发，妇女烫发也不再新鲜，年轻人都效仿刘德华、郭富城等歌星的发型 追求时尚。过去 村里人做一两身衣服穿一两年 到 80年代 已开始嫌那样做土气 宁可到市场上去购买现成的时尚服装。有的人为了社交活动和做生意，也开始穿毛料西服和扎领带。一些名牌的服饰 如‘皮尔卡丹’、‘金利来’、‘花花公子’等 在村民身上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物件。至于吃的 现在肉类鱼比过去吃得多了 饭量也没有过去大 粮食基本可以自给，再有缺的就到市场上去买。

在经济收入逐步提高的过程中，蔡塘人的生活方式也渐渐地同城市趋于一致 城市人所能享受到的一切 蔡塘人已基本上具有 而在收入、居住以及拥有交通工具、通讯设施等方面 实际上都已超过了城市中的一般居民，而且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高，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羡慕的对象。工业化的好处扩大了他们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往来 再加上传播媒介的影响 他们初步获得了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以致当田野工作者问及村里和城市有没有差别时 不少蔡塘人回答：“我们这里也像城市 我们什么都买了。” 乡村和城市没有多大区别 乡村已接近城市。”

正在规划中的蔡塘村从总体布局上分为三区 住宅区、工业区和农业区，整个小区既自成一体，又有公路与厦门市直接相连。新建或完善中的小学、幼儿园、娱乐中心、商贸中心、农贸中心、停车场、服务网点及其配套设施 正在把昔日的村落变成一个规范化的小区 and 漂亮的卫星城镇。

像蔡塘村的人 住在农村不再同过去一样被视为惩罚 反而显示出优越的地位：他们既比城里人自由，又可赚取更多的钱；生活水平、物质条件不比城市差；社区成员能享受到各种福利（顾定国，1996：8）。伴随着这些变化，这里的农民们视野开阔

了文化生活、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也向城里人看齐。蔡塘村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厦门是“同样的”，一些人认为蔡塘村比厦门“更都市”。这不仅是“因为村里最穷的人也有自己的房子，所有的新房子都是西式的，有三到五层高”也不仅是因为村长觉得广州的朋友生活不如他，还因为“现在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像镇里的年轻人”（顾定国，1996:11~12）。

1993年蔡塘村工业小区开发进一步扩大，已有17家企业与蔡塘村签订了前来办厂的合同书。无疑，蔡塘曾经种过蔬菜的农田将会进一步缩小。随着外来人口的涌进，许多农田也可能会逐步由那些外来人口所承包，结果自然是蔡塘村人更进一步脱离农业。和初步接触工业时不同，他们大多喜欢当小老板或利用征地款去投资于工厂、商业当股东而成为小投资者，却不愿在工厂打工。

在闽南的许多村落，由于近年来资本积累较快，村办、民办工业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程度。王铭铭博士描述的溪村（王铭铭，1997a:116~129）就是这样的例子。溪村隶属泉州市安溪县，是闽南漳泉经济文化区的内陆村之一。^①在溪村，村里工业的发展非常初级，但农民转向工人或农业工人的农村工业化过程正在发生，与此相伴而生的是都市空间在农业社区渗透的过程。1991至1992年间，作为县城近郊村，溪村周围近二百余亩的大片山地、农田被县政府推平征用，改造成为“工业开发区”和

虽然在王铭铭的笔下，溪村是80年代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复兴运动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书中描述的该村经济生活的变迁仍不失为反映安溪农村工业化图景的难得资料。引用溪村案例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所属的安溪县在经济学家于祖尧1987年的笔下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之一，“泉州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商品住宅区”以减税和引进外资等措施来推进本行政区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把改革后私有化的农地征购为县政府所有的用地。农民从中获得每亩 1.2 万元至 1.8 万元的经济补偿。1993 至 1994 年间，溪村又被征用一百多亩土地。这些被征用的土地分别成为工业用地、政府用地（用于交通和公路）和教育用地以及新式公寓的建设。

溪村工业化、都市化的初步发展已经可以从目前村落的外貌观察到，村落的中心仍然是以农田和民宅为主，但村落四周已布满了工厂、学校、公路和过去都市里才能看到的高楼等等。尽管目前 2/3 的村民仍然以农副业为重要经济活动，从政府的户籍制度来看，村民也仍被限制在“农业户口”之内，因而溪村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村，但从发展趋势上看，溪村的未来图景将大为改观。村委会计划在村中征用 50 亩土地，把溪村改造成一个“工业新村”。这样，以农田和民宅为主体的村内空间将会有大的变化，溪村有可能成为安溪县或所属凤城镇的一个居民区。

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珠江三角洲深圳的万丰村。郭正林（1996:208~224）对那里人民的生活作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描述：1994 年的经济收入中有 90% 来自工商业，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开始注意保护环境，万丰村的公共领域如公共管理、社会福利与服务、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与保健、公安与治安等，分化程度已经很高，成了社会相对独立的部门，万丰村民的职业构成已经包括厂长经理（23.6%）、自由职业者（18.9%）、企业工人（17%）、文员公关（15.1%）和占很小比例的种植、养殖、财务、保安等。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不断下降，万丰村人大部分都变成了工人、文员、经理、厂长和老板。和蔡塘一样，一般村民居住的建筑是三至四层的楼房，有些村民住房是六层楼，少数居民还拥

有两幢楼房。17%的村民去过香港,一是商务需要(万丰村在香港设立了联络处),二是在港亲戚较多。21.7%的人去过北京,主要是为了游玩,这是国内城市去的最多的地方。从这些描述中人们不禁发出的疑问是:这就是中国农村吗?中国老百姓有那么高的生活质量吗?

浦东的开发与开放是中国90年代世界瞩目的一件大事。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再造几个香港,后来又提出恢复上海的地位,把上海建成大陆上的香港,把浦东建设成一个国际中心。这几年浦东的变化是惊人的,老百姓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浦东多数地方前几年还是一片稻田,现在已经是高楼大厦林立。前几年还在耕田的农夫,现在被要求变成现代工厂的工人和现代都市里的市民。考察过浦东新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这种变化不但在我们历史上没有过,其他国家也找不到(费孝通,1997:238)。因而,浦东新区是中国农村社会最早在很短的时间里和在较高的起点上直接接触了最新现代化经济的地区(费孝通,1997:240)。

李友梅博士在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所在地金桥镇以“浦东新区开发开放中的农民问题”为主题,通过文化人类学的实地观察和面对面的访谈,了解并记录了被访者(其中包括该镇所属川沙县的领导、镇政府的各级干部、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当地农民)对本土开发开放的认识、参与和适应的情况(李友梅,1997)。在李友梅的笔下,浦东新区的农民碰到了史无前例的问题:这些在以农业为主、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乡土社会里生活惯了的人如何一下子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市民?一个靠种植水稻为生的村落,如何在短短一两年内走向都市社区?开发区农民的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正处于怎样的急剧分化之中?

身历经这种变化中的浦东农民会有怎样的激动和困惑？飞速崛起的浦东新区如何对待这些土著以及他们面临的问题？比如，农民最初以为被划入开发区 外国的大企业进来了 他们可以发财了。可是 开发区和大企业开始运行后 他们的就业问题没有解决 而且土地也被收去 每月领 200 多元钱 和上海市区的人一比较 思想上马上对新制度、新变化有了迷惑不安、难以适应的感觉。曾经期待城市生活的农民，当他们住进城市般的新公房并能享受国有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时 却流露出失望、担心和不满情绪。他们在急剧变迁社会中的位置和利益越来越不受重视 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前后左右相比有一种“相对剥夺感”他们在别人眼中的地位似乎处在风雨飘摇中；他们无权改变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 也无从知道如何改变 他们感到似乎成了一种巨大的社会改造势力的牺牲品。

同时 在金桥乡的开发开放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大富大贵的人物。一方面一些开发商投机钻营，大发不义之财。另一方面，一些劳务公司看到上边求成心切 管理体制尚未健全 老百姓不懂法律又怕打官司，就利用国家为征地和就业安置拨款的款项投资房地产业，很快暴发起来。这些暴发者多是原来的乡、村干部和乡、村两级企业主要领导。

金桥乡农民在急剧的开发开放中所经历的社会分化是剧烈的、快速的、不稳定的。它反映出一个传统社区在适应置入的现代化变迁中的复杂和困难。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普通百姓不希望出现的结局。他们感到失去了很多对他们曾经十分宝贵的东西。更令他们失望的是 社区成员之间原有的互助团结 被外资、外企、经济暴利给摧毁了。

在风景如画的鱼米之乡苏南江阴县，有个闻名全国的华西

村 现在它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富。最近的报道显示 华西村的领导人率领 8 人组成的招聘团前来北京，趁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之际 招纳精简机构之后分流出来的本科学历以上、或具有工程师以上职称的专业人才。招聘团提供的人才招聘目录包括了从副总经理到奶牛饲养工程师在内的 80 多个职位。能风风火火地从一个村子里飞到首都向中央招聘人才，华西村的富裕和华西村人的气派可见一斑。

如今，当大城市里的多数居民为是否舍得花钱买辆山地车或小摩托犹豫不决时，华西村人已经开着自家的小轿车带上老婆孩子外出旅游度假、探亲访友或办事了，当报纸杂志上关于“中国人的轿车梦”争论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小汽车已经进入了这里普通农民的家庭。

尽管改革对内地农村和边远落后地区也带来了好的变化，但和蔡塘、万丰、华西那样都市化的村庄相比，那里的变化似乎显得微不足道。近年来，在笔者曾作过多次实地研究的内蒙古翁牛特旗 如农区的桥头镇和牧区的海拉苏镇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当地百姓的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一日三餐有大米、小米、馒头、酸菜等等 温饱问题解决了 砖瓦房渐渐多起来。但大多由于乡镇企业不发达 农民和牧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大的变化 农民以种植业、牧民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和收入来源 四季的活动、家庭生活、孩子的教育乃至日常的玩笑总离不开这两项传统的经济活动，因而很难在这里看到万丰村那样高的职业分化和社会分层，那里也很难见到蔡塘村人穿着的皮尔卡丹和华西人的小轿车，也没有浦东金桥那么急剧的社会变迁。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少超出方圆百里，有些人去过县城乌丹 少部分人去过赤峰市 绝大多数人没有见到过呼和浩特

特和北京城的样子。当然，只有当地社区里的精英人物能享受到大城市里潇洒走一回的殊荣。两年前海拉苏镇组织嘎查达们去北京旅游了一次，这些村干部无一例外地由于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被环卫工人罚款。即便是这些见过些世面的村干部在艳羨北京城繁华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埋怨北京人对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的“管制”有些苛刻。笔者在翁牛特旗居住生活和实地调查的总体感受之一是，当地的农牧民非常羡慕城里人的生活，有退休金、受教育机会、公园、漂亮的楼房和良好的卫生条件。城里人享受的这些好处对他们就像美好的神话一样诱人，不像蔡塘和万丰村的新式“农民”那样和都市生活已经相当接近，甚至在许多方面比城里人的生活还优越。由于这神话遥远得难以感触到，居住在县城乌丹镇的居民和乡镇所在地的城镇居民、乡政府干部变成了他们参照和向往的目标。这些农牧民渴望居住在镇上，拥有一个干部身份和城镇居民户口；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不了，即便和他们有亲戚朋友关系或攀扯上亲戚朋友关系也意味着有面子、有势力。然而，在翁牛特旗这样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即便是这部分城里人在衣着打扮、职业选择、饮食起居、文化生活、价值观念等方面依然相当地守旧。他们虽然居住在城里的居民楼里，能够看到有线电视节目，家中安装了程控电话，但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与居住在牧区嘎查、农区村落里的普通人没有本质的差别。

关于各个地区相差悬殊的发展状况，像上面所列举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如今的村落，分化加剧，异质性增强。北京大学

牧区的苏木和嘎查分别相当于内地农区的乡（镇）和行政村，“嘎查达”是当地老百姓对嘎查主要干部（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的称呼。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乡镇组织”课题组提供了可资对比的当代村落的一些个案（马戎等主编，2000a；冯戎等主编，2000b）浙江的五一村、刘园村和内蒙古的桥头村、大西营村 前两者的经济生活与后者就有很大不同。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桥头镇的桥头村 所辖六个自然村分成管理体制、收入结构、福利待遇等方面不同的两部分：耕种镇周围农田的农民和持非农业人口的城镇居民 那里人均 4 亩多地，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搞家庭副业、交通运输、外出做工的仅占很小的比例 村里日常生活围着农业和机关上班转 平淡无奇 很少变化 缺少五一村、刘园村那样开放的气氛和工商业繁荣带来的喧嚣，村干部也缺少像刘园村领导那样丰富的工商业管理经验，因而全村没有一个像样的企业也就不足为怪了 行政村仅靠房屋出租、菜园承包得到每年 1 万元左右的“预算外收入”由于村集体收入匮乏 而招待费往往超支 村财政入不敷出 只能靠从信用社借钱维持 村民仍然习惯于称自己所属的行政村为“大队”称桥头镇为“公社”。桥头镇的大西营村是本地乡镇企业发达的典型，全村有 68 家瓦厂 其中村集体办的 4 家 采取自愿结合股份制的 64 家，村委会的收入主要是 4 个村办集体瓦厂上缴的利润和股份制瓦厂上缴的陶土“资源费”。但翁旗的大多数村 没有大西营村那样好的资源条件和企业基础 往往以农业、牧业或半农半牧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

在通往西部的列车上，乘客们有时可以看到在铁路边争抢易拉罐、啤酒瓶的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儿童。他们是在用这些辛辛苦苦拣来的易拉罐、啤酒瓶换回新学期的学费。而在另一些更为贫困的地区 孩子们连这种挣钱的机会都没有 甚至不知道易拉罐是什么玩意儿。这些儿童是我们将要考察的西北部

农村一些主干家庭的孩子。这类家庭可由近十人组成，包括祖父母、父母、三到四名子女及一些姑舅叔姨。父母是中国两亿文盲之一。他们的年收入合在一起只有一千多元，而且大多数是“实物”形式的，即他们耕作的一部分农副产品。他们共同居住在两三间简陋的草房或窑洞里，两三个人分享一张床，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和父母亲一样在土地上干活。成人中识字的极少，仅有两个孩子到学龄时能够上学，但也不能指望受到六年级以上的教育。家里的饭食单调，一日三餐能吃饱肚子就已经是孩子们的福气。他们念叨着像“电灯 电话 楼上 楼下”那样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希冀的顺口溜，但自己的日子里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家用电器，更不用说对健康至关重要的卫生设备。那里疾病丛生，而合格的医生却在遥远的城市为那些富裕家庭服务。在为生存进行不断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对较好生活的渴望不断破灭，除了少数人勇敢地流向他乡闯生活外，多数人仍然在巫婆神汉的话语里寻找安慰和寄托。

要命的是贫困地区恰恰是教育落后、社区居民文化素质低的地方^①。在陕西省贫困农村，尤其是秦巴山区，由于教育行政系统的支撑，乡村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村一级都建立了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90% 以上；但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师资水平差与升学型的教育体制并不能直接为乡村社会提供生计帮助。有些家长认为，读书识几个字，能认得钱币面值不被人骗就行了。他们常说：“不上学是放牛娃，上了学也是放牛娃，花钱耽误

^① 全国 1903 个县中有 520 多个贫困县。截止 1993 年中国农村仍有大约 8500 多万贫困人口，年收入低于 300 元；其中包括相当数量温饱难以维持的绝对贫困人口。

时间不合算。”在贵州 贫困户曾占 20% 以上 内蒙古的一些贫困地区的居民 连吃饭的碗都没有 只能在土炕上挖个泥窝 孩子们对着“泥碗”吮吸菜汤 南疆 1/3 的牧民家庭没有毡房 他们夏天露宿在核桃树下 冬季蜗居在土洞里 或在烧热的沙土上度过漫长的寒夜 郭凡生、王伟，1988:3)。

中国居民家庭开支结构中的恩格尔系数^① 值长期居高不下 周其仁等，1986:72~75)。可以预料 在贫困的西部地区 这种状况更甚。对那里的人们来说 满足营养、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成为当务之急。

经济落后与观念上的愚昧、封闭似乎是联体婴乳。在甘肃省和政县罗家集乡一户家徒四壁的汉族农民家中，堂屋正中设有财神神位 两边则贴有供奉“聚宝盆”和“摇钱树”的对联 周星，1995:167)。但这种信仰丝毫没有给当地百姓带来生活上的富足和精神上的上进。或许是数千年重本抑末、轻商贱役历史文化传统的沿袭，支持本地人生计的仍然是单一的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他们视商品交换中的讨价还价为羞耻之事，视商业收入为不义之财，不屑或羞于到市场上出售自产的农副产品。他们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得过且过 许多贫困者的生活态度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没酒喝凉水”。这正如陕西贫困地区许多人的理想生活目标一样：“糊汤杂面不断 天天能吃饱饭 不求

^① 1857 年 欧内斯特·恩格尔发表了一篇关于萨克森尼王国生产和消费情况的研究报告。恩格尔在报告中提出，用于食物的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随着收入递增而减少。这项发现被称为恩格尔定律。恩格尔系数是指食物消费占私人需求的比重。这一指标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最高，各国的一致程度也最高。因而，恩格尔系数以其普适性而闻名于世。联合国就以食物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重 作为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

两响一转 惟求瓦房一间”。数十年之久的输血照顾式和撒胡椒面式的扶贫救济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不少人常年享受救济粮款而心安理得，甚至因救济粮款稍有迟缓便破口大骂。“反正共产党不让饿死人”在一些贫困地区已经成为少数贫困者懒惰和混日子的依据。用救济粮款暴食暴饮的例子时有所闻。某些贫困者，即使面临第二天无米下锅的窘境 仍然闲聊、打扑克、晒太阳。

二、多学科的区域研究及其理论研究和 方法论研究的缺乏

以上图景展示了中国 尤其是农村地区 改革以来迄今为止的一些变化，它们仅仅是中国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冰山一角 在以后的一些章节中 读者还可以看到关于这些个案所在地区近几十年来区域发展的由当地人或旁观者讲述的故事、对于这些故事的论说和评价以及作者对这些故事评说的批评和反思。这个图景色彩之斑斓、差异之巨大远非些须个案研究所能描绘。无疑 改革以前中国农村的图景更多地显示出一致性、同质性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 Donnithorne 用蜂窝状经济描绘了文革时的中国经济格局：由于文革以来强调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强化了相当部分的中国经济发展成“蜂窝状”类型的趋势 那些大部分可自给自足的细胞 或者是地方行政区域或者是企业(Donnithorne, 1972)。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 Lyons 在中国经济体制中所实行的特定的政策、结构和运行中找到了形成这种分割化经济的更切合实际的根源：“蜂窝状经济”是 1958 年以来计划体制运行的结构特征(Lyons, 1986)。这种分割化的趋势展示的另一层含义是：各个区域之间

十分相似，非关税壁垒高高筑起。这些学者预测，从长期来看，只有通过技术现代化和上海那样的大工业中心对内地经济的不断扩散，才能打破经济的“蜂窝状”性质。改革前后两种图景的比较给我们留下的深刻认识，就是这种蜂窝状经济格局被打破了，各个区域和单位的实力水平和发展趋势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其内部的经济结构和功能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同时，这种图景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难解的疑问，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二十年前同质性很强的中国各地农村，在大致相同的大政方针下，何以出现如此迥异的发展状况和结果？未来图景的变化趋势如何？

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导致了区域科学、区域发展研究在中国的兴盛。在回顾中国区域发展研究所走过的道路时，北京大学城环系的杨开忠（1993:2）教授认为：

声称区域是其核心的地理学，长期致力于区域发展研究，曾经硕果累累。但是，面对新的环境和挑战，地理学者们不能不抛掉自豪和欣慰，调整视角，以求再创辉煌。长期舍弃地理空间，致力于没有空间的“点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也深深感到传统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的苍白和不着边际，不能不考虑“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在经济运行中的意义，破天荒地给予区域发展在其“帝国主义”的知识体系中以应有的位置。著名经济学家孙尚清高瞻远瞩，从开始就把区域发展作为其创立生产力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张培刚则在长期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上，在 80 年代得出结论：传统发展经济学所以在“大国”不能成功地发挥作用，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对区域的忽视”。因此，区域发展被作为他倡导的新型发展经济学的三大特色之一。一度偏重人际关系和群体组织研究的社会学，近年来，则吸收地理学的区域方法，强调区域调查和分析，丰富和发展传统的社区理

论和方法，在社区研究的坚实基础上，对区域发展研究的大厦贡献着自己的构想和成果。

上述中肯的评论忽略了笔者已经提及的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以及在后来的章节中将要讨论到的一些政治学者（Alan Liu, 1992; Yia-lin Liu, 1992; Parris, 1993; Naughton, 1988; Paine, 1981）对区域发展研究的贡献：人类学者通过扎实的长期的田野工作为区域发展提供了细致入微的第一手资料；政治学者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互动（集权还是分权、依附还是自主）、政治斗争和革命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视角，对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和演变提出独到的分析。

但在中国区域发展研究中，这些学科往往独立作战，各自为政，很少联合与合作。对此，杨开忠教授有这样的评论：

“无论是区域思想悠久、成果辉煌的地理学，还是后起之秀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在实践中都同样发现，区域问题综合复杂，是任何单一学科难以胜任的，需要结合各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建设一门新的综合科学——区域科学”（杨开忠，1993:2）。

按照美国区域科学创始人伊萨德（Walter Isard）的说法，区域科学是一门研究区域问题的新型交叉学科，是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伊萨德，1994: 1）。从中国现有情况看，各学科区域发展研究中依然各行其是，距离建立伊萨德倡导的区域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学术研究往往落在实践的后面，当我们在书桌和电脑台旁，或现今日益流行起来的读书会、研讨会上为某个学术问题苦思

冥想或争论不休时，现实世界却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在 80 年代初，我国就开始兴办特区，吸引外国资金、技术，发展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全国先后开辟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五大经济特区。1984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邓小平，1993：52）。由此，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神州大地上兴起。52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办起来。1988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策，要实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其中心思想是包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金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在内的沿海地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们周围不断涌现的景象是：黑龙江省的边境小镇能够尝到时鲜的广柑，北京、沈阳和哈尔滨的市民当天可以从早市或晚市上买到通过“绿色通道”运来的山东蔬菜，新疆的烤羊肉串、兰州拉面、陕西羊肉泡馍、四川的鸳鸯火锅、山西的刀削面、富有地方风味的鲁粤川扬菜系等等。尽管不见得是原汁原味，甚至有可能是假冒伪劣，但在中国随便一个大中城市的闹市区都可以找到它们的门面和摊点。而麦当劳、比萨饼、吉野家等来自国外的快餐店也在中国主要大城市抢摊布点。千千万万农民从各个方向，通过各种渠道，以多样化的方式进入大城市，大小工厂、公司打工或做生意。其中一个主要的流向就是从西部、北部的边远地区、内陆进入沿海的大中城市。东南沿海处在开发开放中的经济特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大规模外资投入的同时，还可以得到边缘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因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规范化，发达地区的投入产出比率高于不